



全国
获奖

爱情短篇小说
选评

陆建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QUANGUOHUOJIANG
AIQINGDUANPIANXIAOSHUO
XUANPING

全国获奖爱情



短篇小说选评

陆建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南京

责任编辑 晓 东

全 国 获 奖
爱 情 短 篇 小 说 选 评
陆建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高邮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44 千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

ISBN 7-305-00724-2

I·51 定价: 2.80元

目 录

何时一尊酒 重与细论文……………汪曾祺（1）

——陆建华《全国获奖爱情短篇小说选评》代序

论新时期获奖爱情短篇小说……………（5）

曲折微妙 诗意盎然……………（24）

——评肖平《墓场与鲜花》

墓场与鲜花（故事梗概）……………（29）

彻底否定“文革”的生动教材……………（36）

——评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故事梗概）……………（41）

深邃的意境 丰富的内涵……………（47）

——评李国文《月食》

月食（故事梗概）……………（52）

于幽默中发人深思……………（60）

——评刘富道《南湖月》

南湖月（故事梗概）……………（65）

倔强自尊 积极向上…………… (69)

——评陈建功《丹凤眼》

丹凤眼(故事梗概)…………… (74)

爱情联结着战火 挚爱攀附着仇恨…………… (78)

——评罗旋《红线记》

红线记(故事梗概)…………… (83)

贫瘠土地上的苍白爱情之花…………… (88)

——评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故事梗概)…………… (93)

生动风趣 痛快淋漓…………… (97)

——评张石山《镰柄韩宝山》

镰柄韩宝山(故事梗概)…………… (103)

奇特的爱情 健康的人性…………… (109)

——评汪曾祺《大淖记事》

大淖记事(故事梗概)…………… (116)

对青春美与道德美的由衷赞颂…………… (121)

——评刘绍棠《蛾眉》

蛾眉(故事梗概)…………… (127)

春天里的纯朴爱情…………… (132)

——评王振武《最后一篓春茶》

最后一篓春茶(故事梗概)…………… (137)

黑暗不能扭曲的美的灵魂·····	(141)
——评航鹰《明姑娘》	
明姑娘(故事梗概)·····	(146)
非正常年代里的非凡爱情·····	(154)
——评石言《秋雪湖之恋》	
秋雪湖之恋(故事梗概)·····	(160)
“碱水”里泡过的人 金子般珍贵的心·····	(167)
评张贤亮《肖尔布拉克》	
肖尔布拉克(故事梗概)·····	(173)
独特的题材 诗意的构思·····	(181)
——评苏叔阳《生死之间》	
生死之间(故事梗概)·····	(186)
傣家心灵美 老曲翻新声·····	(190)
——评彭荆风《今夜月色好》	
今夜月色好(故事梗概)·····	(193)
后记·····	(198)

何时一尊酒 重与细论文

——陆建华《全国获奖爱情

短篇小说选评》代序

· 汪曾祺 ·

建华的《全国获奖爱情短篇小说选评》编成，来信嘱我写一篇序。我以为，从新时期10年获全国奖的短篇小说中，挑选出一部分爱情题材的郑重地推荐给读者，并对这些作品从思想到艺术进行细致评述，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我对这些小说读得不全，故只能说一点不着边际的话，说一点我对评论的看法。如果能和建华的文集有一点关联，那就算歪打正着了。

曾有搞评论的朋友问我对当前的评论有什么看法，我说主要缺点是缺乏个性。评论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看风使舵。评论家应该独具只眼，有自己的创见。评论家应该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并有自己独创的说法，要能说出别人说不出的话来，即使片面一点，偏激一点，也比淡而无味的温吞水好。“评论”从某个意义来说，就是“发现”。徐悲鸿发现了齐白石，发现了泥人张。他把齐白石和泥人张都抬得很高。他说齐白石是一位大师（齐白石在当时的名气还不太大），说泥人张是中国的米盖朗齐罗。有人说他推崇得太过

了，徐悲鸿说：“我对自己的讲话总是负责任的。”我很欣赏徐悲鸿的这种态度。“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评论家应该有这样的热情。评论文章要能使读者感觉到评论家这个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样才能使读者觉得亲切，受到感染。有些作家的作品可以不用署名，一看就知道这是某人写的，评论家能做到这样的似乎不多，这是很多人不爱读评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建华的《选评》所选择的作品篇目看，他只选了16篇作品，不是把所有获奖的爱情题材作品都搜罗进来，一视同仁，平均对待。而是宁缺毋滥，我以为这态度是好的。既有取舍，一定有个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公认”，而是“只眼”。自己觉得对哪些作品有话可说，于是去评定一下，有些作品尽管声誉很高，但觉得对它说不出什么新鲜的意思来，便落选了。这样，这本评论集就很可能有点个性的。

我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评论和鉴赏分了家了，我认为还是合起来好。大家都说现在的评论有一个模式，即上来先用相当多的篇幅谈作品的思想内容，当中谈一点艺术特点，最后指出作品的不足。其实何妨颠倒一下呢，先从作品塑造的形象入手，再来探索形象的思想内涵？记得李希凡同志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评论也要有一点形象思维，我是很赞成的。恐怕不是需要有一点，而是首先要从形象接近乃至深挖这个作品。作者在形成作品的时候，一开头总是感性的，直觉的，在感情里首先活跃、鲜明起来的是形象，读者接受一个作品的时候，开头也总是感性的，直觉的，使他受感动的是形象。这样才能造成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完成全部创作过程。为什么我们的评论家总是那样理智，那样冷若冰霜，对着一篇作品，拿起手术刀来一刀就切到作品的思想呢？这种

“唯理”的评论是不能感人的。——评论也要使人感动，不只是使人信服。至于“不足”，任何一篇作品都是能够指出不足之处来的，但是我觉得评论家指出作品的不足往往没有多大用处。评论家既不能自己动手，把这个作品改一改，把不足之处弥补起来；作家也未必肯采纳评论家的意见，照他的意见改写作品，即使评论家指出的不足是有道理的。我不是反对任何一篇评论指出作品的不足，但不赞成每一篇评论都有这样一个尾巴。篇篇如此，让人感到无非是为了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我过去读建华的评论，尚无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之感，却能用朴实无华的文字，写出自己对作品进行认真揣摩后的具体感受，从而能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这是建华的评论文字长处所在吧。

中国的评论大都只评作品，很少涉及作者。其实，作品的风格和作者的个性是分不开的。蒲封说过：风格即人。如果在评论中画出一点作者的风貌，则评论家就会同时成为作者与读者的挚友，会使人感到亲切，增加对作品的理解。我曾读过肖伯纳写的一篇对一个著名摄影家的评论，几乎没有一句谈到此摄影家的作品，只是说他开了一家旧书店，有人去买一本书，他书店里没有，告诉买主，他要的那本书写得不好，他可以另外给他介绍两本同类的书，买主看了，很满意；他的旧书店里还卖文物，这都是他花了不多的钱搜集起来，但是一经他品评，就会变得很名贵。这样，我们便知道此人的艺术趣味很高，至于他的摄影的不俗，就不言而喻了。我觉得这样写评论，是很聪明的写法。中国的评论家不太善于知人。我希望建华能多和作家交交朋友，这样，就有可能用精炼的笔墨勾画出作家的笑貌，并以印证他的作品。一个评论家也该学会一点小说家的本事。

最后一点，我觉得评论文章应该像一篇文章，就是说要讲究一点语言艺术，写得生动一点，漂亮一点。中国的评论似乎已经形成一种通用的文体，都有那么一股评论腔，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八股气。评论家好像大都缺少幽默感。有的评论家在平常谈话时也还有风趣，到了写评论的时候，就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起来，如我们家乡所说的：“严乎其然”，“板板六十四”。我希望我们的评论家能够松弛一点，随便一点。晋朝人手挥麈尾，坐而谈玄；杜甫诗：“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我以为那是蛮舒服的。中国的评论家文章写得活泼的，据我所知，有刘西渭（即李健吾）先生。建华不妨把他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找来看看。

建华是我的小同乡，都是高邮人。说起高邮，很多人只知道高邮出咸鸭蛋。上海卖咸鸭蛋的店铺里总要用一字条特别标明：“高邮咸鸭蛋”。我们那里的咸鸭蛋确实很好，筷子一扎下去，吱——红油就会冒出来。不过敝处并不只是出咸鸭蛋，我们家乡还出过秦少游，出过研治训诂学的王氏父子，还有一位写散曲的王西楼，文风不可谓不盛。近些年也出了一些很有才华的文学中青年，建华是其中的一个。建华嘱我写序，我本着乡曲之见，写了上面这些。所言未必有当，随便说说而已。

1989年4月序于北京

论新时期获奖爱情短篇小说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学创作突破各个“禁区”的进军声中，爱情题材与“伤痕文学”几乎同步前进，也同样引人注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始，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爱情题材的小说创作高潮也随之到来，这在历届全国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中看得很清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获选作品中，爱情题材的各占1/5。到第三届，即1980年，爱情题材的作品竟多达10篇，占全部获奖小说的1/3，其中包括《月食》、《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此后各届评奖，每年也都有爱情的作品入选，这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对爱情题材小说的重视与喜爱。

如人们所了解的，在前六届评选活动中，主要是依据群众投票多寡决定其作品是否入选，考虑到这一事实，在已获奖的爱情短篇小说中，显然包含着人民群众究竟喜爱什么样的爱情小说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从这当中，也定然可从总结出值得我们深思、也值得我们探讨和记取的关于爱情题材的小说创作的经验和教训。

新时期的爱情小说的空前繁荣绝非偶然，它是爱情文学

挣脱多年来“左”的思想束缚后的一次痛快淋漓的总喷发。如同运行于地下的炽热的岩浆，一旦遇到一个合适的火山口，便会不可遏止地奔涌而出，汨汨滔滔，蔚为壮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爱情题材的作品要么被纳入政治宣传的固定框框内，作机械的舞姿；要么被视为“小市民的庸俗趣味”，“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充分暴露”予以批判或取消。就连在解放初期出现的以《登记》（赵树理）、《春种秋收》（康濯）等为代表的比较优秀的爱情小说，也无一例外地被纳入政治宣传的轨道内。试看《登记》的诞生经过：据作家马烽回忆，“1950年夏天，当时面向全国广大农村的通俗刊物《说说唱唱》，为了配合宣传新颁布的《婚姻法》，急需一篇以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有着厚实生活基础的赵树理慨然承诺了下来。‘任务’，和‘生活感受’，一拍即合，他在很短时间里交出了这篇评书体的短篇小说——《登记》。”^①再从作品本身来看，也隐约可见《登记》配合政治宣传的痕迹。只不过因为作家运用他熟悉生活的优势，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评书形式，把这些痕迹掩饰得不易为常人觉察罢了。及至在《登记》以后相继问世的一大批配合新婚姻法宣传的爱情婚姻小说，虽然很有声势，但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作者都能像赵树理那样有厚实的生活基础和对农民的透彻了解，所以，对这些作者来说，“任务”和“生活感受”很难一拍即合，其作品就自然带有更明显的图解政策的宣传烙印。这个时期的爱情婚姻小说一般都表现了作者歌颂新社会的良好愿望，和赞颂新人物的饱满热情，但

^①刘再复等，《中国农民恋爱和婚姻的悲喜剧》；《十月》，1980年第5期。

共同的弱点是，在生活的底蕴上开掘不深，作者念念不忘削艺术之足，以适应政策宣传之履。结果，其作品不仅情节雷同，人物性格概念化，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也失之肤浅。

1957年，随着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短暂的和缓气候，在“干预生活”口号下，爱情小说创作出现了难得的短暂繁荣。比之那些宣传新婚姻法的小说，像《红豆》（宗璞）、《在悬崖上》（邓友梅）、《在泉边》（方之）、《小巷深处》（陆文夫）、《我和我的妻子》（俞林）等作品，无论在题材的创新与探索，还是在人物的塑造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大胆地对男女青年的复杂情怀进行细致生动的描绘，甚至对恋爱过程的热烈、诚挚、欢乐与痛苦也敢于进行开放性的描写。特别重要的是，作家们全然不顾为政策服务的“运动文学”的种种清规戒律的约束，从生活出发，不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那些具有高洁心灵的男女青年，还尖锐地抨击了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蜕变的负心汉，和那些由于生活地位上升而厌弃糟糠之妻的新时代“陈世美”们。不难想象，继续保持这股创作势头，我国的爱情小说创作将会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宽广大道上向前迈进一大步，作家们完全可以通过爱情这个特定窗口，向人们展现更为广阔的感情世界，和更深广地揭示社会生活矛盾。不幸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左”的思潮再次泛滥，爱情作品受到又一次更为粗暴的政治声讨式的批判。这样，从1958—1965年，爱情小说创作便真的一蹶不振了。

可以这样说，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爱情小说的创作始终摆脱不了政治宣传的框框，因而写得拘谨，程式化，难以实现从数量到质量上的真正繁荣。至于从反右以后到10年动乱之前，我国当代文学中的爱情小说创作虽然不是

一个空白，但却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淡季。而当“文革”风暴铺天盖地而来之后，连过去那几朵少得可怜的、经过精心打扮才敢怯生生地探出头来的爱情小说之花，也一律夭折于这场极“左”的飓风之中，大地变成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但是，生活中的爱情之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特别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肆虐成性，使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民群众受到迫害，恋人含泪分手，家庭妻离子散，多难的祖国大地上到处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连作家们也想象不到的或悲壮、或凄惨、或缠绵、或哀怨的婚姻爱情活剧。这就为新时期爱情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从思想到创作素材上都作了充分而多方面的准备。一旦扫除“四害”，特别是随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深入展开，多年来捆绑住作家手脚的“左”的绳索终于被解除了，解放了思想的作家们便怀着革命义愤，首先借助于人们熟悉与重视的爱情小说，控诉“四害”劣迹，展示人民于动乱时代表现出来的高尚道德情操，颂扬历尽千难万劫而不变的忠贞爱情，这当然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

新时期以来的爱情题材小说的创作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

从1976年冬至1979年是第一阶段，这是新时期爱情小说创作的开始阶段。其特征是来势很猛，并且大多打上“伤痕文学”的印记，十有八九是写10年动乱中的社会生活内容。

1980年是第二阶段。这一年的爱情小说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并且显示出一个承上启下的联结作用。从爱情

婚姻角度揭批“四人帮”的势头仍在继续，但却更深入了。作家们已不再以写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为满足，而是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作更加深入的探讨和认真的反思。

从1981年往后是第三阶段。从这开始，新时期的爱情小说创作进入一个稳定持续的发展期。

让我们先对新时期第一阶段的获奖爱情短篇小说进行一番概要的评述。

我们清楚地记得，当“伤痕文学”一扫10年浩劫中文艺“瞒”和“骗”的恶劣风气，开始真实地描绘人民群众在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重压下的深重苦难时，大量爱情题材和有关爱情描写的作品，尤其显得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婚姻爱情总是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着，透过对人的心灵历程的描写，更容易揭示出人物的命运和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于是，一个少见的“爱情作品热”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主义的一种惩罚，自有其社会历史之必然。

《墓场与鲜花》和《我应该怎么办》，是新时期最早出现、并在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的优秀爱情小说。这两篇作品所反映的生活，虽是文化革命大动荡年代的一个侧影，所写的也只是几个年青人坎坷多灾的经历，但却联结着社会斗争的极其错综复杂的现实，它们所描绘的是凡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极为熟悉的生活内容，故特别容易引起千千万万读者的共鸣。

在这一时期的获奖爱情小说中，作家们从不同的生活侧面，真实而动人地描绘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所特有的千奇百怪的生活画面：子君先后两个家庭、两个丈夫、两次当“反革命家属”的悲惨遭遇（《我应该怎么办》）；沈

岩和彭稚凤”以前的老师今天做了他学生的学生”的师生关系的颠倒以及他们之间爱情关系的波折（《抱玉岩》）；青年女工们在一个时期内竟然把爱上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或是爱上一个归国华侨看成是荒唐可笑甚至大逆不道的事情的反常心理（《眼镜》、《姻缘》）等等。透过这些血和泪的画面，我们看到10年动乱时期是非颠倒、人妖混淆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就在那一个个令人悲、令人愤、更令人深思的爱情故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①

与同期出现的若干婚姻爱情为题材的作品相比，这一时期的获奖爱情小说还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不以罗列凄凄惨惨的血泪事件的办法去赚取读者的眼泪，也不通过渲染某些恐怖场面或放纵情欲描写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作家们而是通过严峻的现实描绘，赞美人民群众的美好性格和高尚情操，热情讴歌与黑暗势力相抗衡的光明力量。这样，作品虽然写了20世纪70年代中的种种生活悲剧，但悲而愤，悲而壮，同样给人以信心和力量。《墓场与鲜花》中的那对年轻人在夜色如磐的动乱日子里，庄重地举行了婚礼，这是一对不屈服于“左”的高压的有志青年历尽艰辛后的美妙结合，同时也预示着他们将更加坚决地、同心同德地走向新的更加壮丽的人生。新娘朱少琳在那个难忘的婚礼上说：“我们是在墓场举行婚礼，但是鲜花就在我们前面。”这是何等开阔的胸襟，又是何等高昂的战斗决心！在《眼镜》和《姻缘》中，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